



沉重的肉身

——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

刘小枫



刘小枫 著

沉重的肉身

UNBEARABLE BODY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邵敏
封面装帧 赵为群

·告别二十世纪哲学随笔·

沉重的肉身

——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

刘小枫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插页 5 字数 218,000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001 - 15,000

ISBN7 - 208 - 03021 - 9/G·545

定价 18.00 元

总 序

近来,随笔在全国方兴未艾,这或许是因为人们发现,这种贴己的、自由的文体,在写作和阅读中建立起了一种较之其他文体更方便沟通和理解的纽带。但我们恰恰是迟疑着不信任轻易许诺认同前提的沟通和理解。

我们持有一种试探的入思态度和与此同步的写作态度,即既与诗化、浪漫化保持距离,也不在一般意义的人生沉思或玄想里侠义抒情,不在大而无当的问题中徜徉,逃避尖锐地提问和自我审视。

这当然是一种夜行。我们苦于不知道怎样给自己如此夜行的文字和写作“命名”。

因为我们并没有成熟的、形式臻于完整的文字奉献给成熟的时代和成熟的读者——这里每一个“全称”词都需要限定,诸如“我们”。

“我们”是指这套丛书的作者们,它敞开在未知的、陌生的人群里,那里或许会、甚至一定会酝酿着前面文字和文字形式的颠覆。“我们”是一个虚拟的假设。但是没有这假设,我们几乎寸步难行。

最初的动机并不是同文体而是同作为文化范畴的时间联系在一起。

2 总序

作为文化范畴的时间，是一定的文化背景下的时间概念。这套丛书的设施正值“二十世纪即将过去”，是我们已经经历并且还在经历着的。告别二十世纪，在我或我们的理解中，即回答对于一代甚至几代中国人说来——这个世纪意味着什么。

换一个角度说，要摆脱中国文化重复的困境，方式之一，就是要沉淀一些问题，找到这些问题的界限，使我们有可能面对将来。否则我们即使在物理时间中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实际仍生活在二十世纪，甚至更久远的时候，就像许多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传统阴影中一样。

这些问题大致涉及到客观真理问题(必然性、连续性、决定论、目的论都属于它的范畴)，理想问题，主体性问题，方法论问题，语言问题，客观性问题(既反形而上学本体论、又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个体性问题，以及超验的中立性问题……当然还可以有另外的归纳。必须说明的是，这些问题并不是每一位作者都直接论述的，但却都以自己的方式涉及到。

事实是，这些问题的深入引起的哲学的革命在西方早已发生，而在中国，它们也已然成为入思的不可或缺的问题意识背景。

必须强调并区分的是，这里所说的背景，可能是问题意识的知识视野，也可能是在问题的反省中个人经验断裂的敞开。即是指引着、隐喻着超验的个体有限性的界面的敞开。它较之知识视野的横向关联更具有一种当下性的纵横开阔的张力。

我们强调与语言事件相关的个人的初始经验。

即日常语言说的个人对自身经历和遭遇的反省。这种经历和遭遇如果不流失于重复的记忆,那它一定被置换了背景,即它一定是在问题意识的背景上被反身观照着。

这种反身观照已经是语言化的,即经历着既成语言向生成语言的转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的经历和遭遇在二十世纪问题的审视中已成为个体案例的分析,由此二十世纪的问题,即便是西方的问题,也不再是一种远距离的知识性的取舍,而是一种切身着的问题的表达或表达的契机。

没有这种问题意识和将问题尖锐化以冲破传统的努力,文化民族主义的源远流长和历史理性主义的坚不可摧几乎不可能让自律个体崭露生命的头角。

于是我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问题意识背景出发,接近着、或者提出了汉语哲学的问题,为着在生存、思维、表达一体的语言中找到问题的生成与转换,亦为着将个人的经历和遭遇中的问题纳入可整合尤可疏导的学术规范,成为在有限的前提下可理解和可沟通的。

向关心、支持这套丛书编辑、出版的出版界朋友致谢,他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邵敏先生、上海远东出版社的郑西海先生,上海三联书店的倪为国先生。他们的共同努力使这套丛书得以问世。

萌 萌

1994年12月4日于海南大学

前 记

构思这部小品文集有好些年了。一九九〇年，北岛兄约我给他主编的《今天》写稿。那时我在巴塞尔念书，正临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考试关，满脑子单词和词尾变化规则。在古典语言课上读了一些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散文，联想到读过的现代小说，即兴写了“沉重的肉身”。这篇几千字的小品刊发后，出我意料，得到一些文学界朋友的谬奖，鼓励我再写。打那以后，脑子里不时冒出一些意念。但仅是意念而已，功课繁重，没有精力来编织这些纬语，也就搁下了。

一九九三年到香港，老友林道群嫌我的学究文字艰涩难懂，文风变得让人厌烦，问我有没有非学究性的文字，我就把臆想中的这部文集给他，答应半年交稿。谁知四年如烟，学务、编务缠身，全是道问学的学究事，这些小品写得断断续续，总不能如意。写小品比写学术论著费精耗神得多，如今终于成章，算是生命经历的分。

文集的构思费了一番心思，读者要是留意到各篇顺序的刻意安排就好了。所谓现代性伦理，我指的是人民伦理和个

2 沉重的肉身

体自由伦理。时下人们正身不由己地从人民伦理脱身出来，转向个体自由伦理。本书的叙事纬语从人民伦理转到自由个体伦理，主要围绕中欧两位当代作家的叙事，以探讨两种不同的个体自由伦理的差异。

文集做预告已三年多，害得有读者不时徒劳寻问，在此深表歉意。纬语没有写完，成熟的意念还有好些——赫尔岑讲的“家庭戏剧”、阿玲讲的自己与米勒的故事、帕斯捷尔纳克讲的拉拉故事、艾柯讲的修院故事……都有意思。为了尽快向友人和关心的读者交待，先就此打住。

原刊于《今天》的“沉重的肉身”当时写得仓促，这次重新写过。部分篇章分别在《读书》月刊和《上海文学》刊发过，结集时都有不同程度的增订。

刘小枫

1998年5月于香港

引子：叙事与伦理

一九六七年春天，院子里只剩下我们一群十岁左右的小孩子，父母们和大孩子们都参加“文化大革命”去了。有的在学习班里背主席语录改造思想，有的在大街上通宵达旦辩论造反还是保皇，有的在不知什么地方彻夜印传单。那个春天的日子，其实是相当激动人心的。

乘大人们不在，院子里的小孩子分成两个阵营，用自制的木头大刀和长矛玩相互厮杀的游戏——从底楼杀到三楼，从三楼杀到底楼，免不了有喊叫、受伤、委屈、流血、哭号。我们每天晚上都玩这种游戏，敌对的两个阵营每天都在分化、重组，有人叛变、有人当奸细、有人当领导核心。

一天——那个激情万端的春天并无特色的一天夜里，敌对阵营的头目和谈失败后，指挥自己的部队（一方番号是“井冈山兵团”，另一方番号是“延安纵队”）开始厮杀，院子里闹哄哄的。突然停电了，整个院子一下沉入黑洞洞的深渊，厮杀的双方再也看不清对方。世界刹那之间不在了，没有父母在身边、又没有电灯的处境使模仿的革命游戏激情变成了不知身

2 沉重的肉身

在何处的恐惧。两个阵营之间虚拟的敌对伦理不见了，大家不分政治观点、不分男女界限，牵着手、搂着腰，挤缩在一起，不知如何度过入春后依旧冷冽的这个寒夜。

我们中间有一位刚念初中三年级的大孩子，也许因为高度近视，没有上大街辩论或散传单。他并没有参加我们的革命游戏，只是同时给斗争的双方提供战略和战术指导。只有他在没有电灯的黑暗中显得比较自在。

黑夜静得让我们心惊。这个大孩子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他坐在破旧的窗台上，讲起了柯南·道尔讲的故事，故事中的惊险覆盖了我们心中的恐惧。接着，他讲了凡尔纳讲的奇妙的故事、雨果讲的令人感伤的故事、梅里美讲的让人痴想的故事。他叙述的时候，我们不再惊恐地四处张望，不再慌张地想要寻找蜡烛，甚至不再期待电灯重新亮起来。这个大孩子讲的别人讲的故事，像温暖的手臂搂抱着我们，陪伴我们被遗弃的、支离破碎的长夜。时间、若有若无的时间被叙事填满了。

从那以后，我们不再玩分成两个阵营厮杀的游戏，而是要这大孩子讲故事。直到有一天夜里，大街上的革命斗争已经动枪了，院子没有停电但必须关灯，我们围坐在大孩子脚下，他仍旧坐在破旧的窗台上讲故事——讲雨果讲的《笑面人》，大家都忘记了关灯，一颗半自动步枪子弹不知从何处飞来，横穿过大孩子的脸颊，崩掉了他三颗大牙。

据说，人类开始讲第一个故事时，与我们院子停电时的处境差不多：原始穴居人在夜色降临后，感到时间的支离破碎和

空间的若有若无，有一天——故事总是从这暧昧的有一天开始，一个年长的穴居人讲了一个故事，讲的是……听过故事以后，穴居人心里暖和起来，明天的艰辛和困苦变得可以承受了。

叙事改变了人的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感觉。当人们感觉自己的生命若有若无时，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破碎不堪时，当我们的生活想像遭到挫伤时，叙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像的空间，甚至重新拾回被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当幸福在时，我们便拥有一切，而当幸福不在时，我们便尽力谋求它。”如果伊壁鸠鲁的这句话说得恰当，又如果谋得幸福是伦理学的基本主题，那么，叙事对于人们谋求幸福就是必不可少的，它既可能是人们关于幸福（或不幸）的知识，又可能是人们在幸福之中的时间和空间。“神往往不过是叫许多人看到幸福的一个影子，随后便把他们推上了毁灭的道路。”梭伦这个神无处不在，并没有随着现代性的社会进步而隐退，而是不分国家和民族一律平等地尾随每一个人的身体。这个神名叫偶然。人的叙事是与这个让人只看到自己幸福的影子的神的较量，把毁灭退还给偶然。叙事不只是讲述曾经发生过的生活，也讲述尚未经历过的想像的生活。一种叙事，也是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一种实践性的伦理构想。

什么是伦理？所谓伦理其实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反过来说，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有多少种生命感觉，就有多少种伦理。伦理学是关于生命感觉的知识，考究各种生命感觉的真实意义。伦理学自古有两种：理性的

4 沉重的肉身

和叙事的。理性伦理学探究生命感觉的个体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进而制造出一些理则,让个人随缘而来的性情通过教育培育符合这些理则。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就是理性伦理学的大师。有德性的生命感觉,就等于是思辨的才能。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叙事伦理学看起来不过在重复一个人抱着自己的膝盖伤叹遭遇的厄运时的哭泣,或者一个人在生命破碎时向友人倾诉时的呻吟,像围绕这一个人的、而非普遍的生命感觉的语言虚气。叙事伦理学通过叙述某一个人的生命经历触摸生命感觉的个体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道德原则的例外情形,某种价值观念的生命感觉在叙事中呈现为独特的个人命运。理性伦理学关心道德的普遍状况,叙事伦理学关心道德的特殊状况,而真实的伦理问题从来就只是在道德的特殊状况中出现的。叙事伦理学总是出于在某一个人身上遭遇的普遍伦理的例外情形,不可能编织出具有规范性的伦理理则。

荷马、索福克勒斯、但丁、莎士比亚是叙事伦理学的古典大师。叙事伦理学从个体的独特命运的例外情形去探问生活感觉的意义,紧紧搂抱着个人的命运,关注个人生活的深渊。叙事伦理学家们坚持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深渊,当人们往下看的时候,会觉得头晕目眩。”(毕希纳)“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仔细审视,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与梦想。”(基斯洛夫斯基)叙事伦理学在个别人的生命破碎中呢喃,与个人生命的悖

论深渊厮守在一起，而不是像理性伦理学那样，从个人深渊中跑出来，寻求生命悖论的普遍解答。理性伦理学的质料是思辨的理则，叙事伦理学的质料是一个人的生活际遇。理性伦理学要想搞清楚，普遍而且一般地讲，人的生活和生命感觉应该怎样，叙事伦理学想搞清楚一个人的生命感觉曾经怎样和可能怎样。这并不等于叙事伦理学根本不理会应然——那样就谈不上伦理的道问学了，它只是不从与具体的人身不相干的普遍理则，而是从一个人曾经怎样和可能怎样的生命感觉来摸索生命的应然。听故事的人为叙事中的“这一个”人的个体命运动了感情，叙事语言的虚气就不经意地形塑或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感觉，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听故事和讲故事都是伦理的事情。如果你曾为某个叙事着迷，就很可能把叙事中的生活感觉变成自己的现实生活的想像乃至实践的行为。叙事伦理学的道德实践力量就在于，一个人进入过某种叙事的时间和空间，他（她）的生活可能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道德的实践力量是理性伦理学所没有的。

我们听过《红岩》、《烈火金刚》、《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样的故事，才有了分成两个阵营厮杀的游戏。经过那大孩子讲故事的夜晚以后，我发现自己的命运被那些夜晚的叙事决定了。大孩子讲的十九世纪西方古典作家们讲的故事不仅有一种抱慰生命中惊惶时刻的力量，也改变了我对生活的想像和对某种生活品质的信念。

讲个人命运的叙事，是原初的伦理学。人类经历过的被遗弃的长夜数也数不清，与此相伴的是数也数不清的、难以辨认的白日恐怖。在被遗弃的长夜和难以辨认的白日恐怖的时

间中,人类讲了好多故事。故事多半是虚构的,但确如亚里士多德说过的,叙事的虚构是更高的生活真实。叙事编织出另一种时间和空间,给个人的生命被遗弃的长夜带来光亮,构造出玻璃般的言语世界将恐怖隔离开。叙事中的现实也不外乎某个人的幸福或不幸(多半是后者)的遭遇。但与现实中的个人遭遇不同,叙事中的遭遇是依照人的自由意志和价值意愿编织起来的。现实的历史脚步夹带着个人的命运走向无何他乡,在叙事的呢喃中,“我”的时间和空间却可以拒绝历史的夹带,整饬属己的生命经纬。叙事伦理学是更高的、切合个体人身的伦理学。

在前现代的社会,规范伦理主要是由宗教提供的。在现代社会,叙事纷然,叙事技巧杂陈。叙事艺术(小说)的发达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事件。现代人听故事(小说)、看故事(电影)太多,叙事已与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伦理分不开。为什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和能够讲自己的故事。在现代社会,随着平等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发展,有能力、有权利讲故事的人多起来。这是原因之一。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社会中生活的可能性增多了。一方面是经济、政治生活形式的变化提供的更多生活实践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文化生活形式的变化提供的更多生活想像的可能性。叙事不仅讲述曾经有过的生活,也讲述想像的生活。生活的可能性和多样性的增加,必然带来叙事的可能性和多样性的增加,反过来说也一样。

伦理就是整饬属己的生命经纬,现代伦理不是像古老的伦理那样,依据一套既定的道德体系来整饬属己的生命经纬,

而是依据个人的心性来编织属己的生命经纬。现代性伦理是个体化的,故事当然多起来。

现代的叙事伦理有两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叙事呢喃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像,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印或经历的人生变故。自由伦理不是某些历史圣哲设立的戒律或某个国家化的道德宪法设定的生存规范构成的,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偶在个体的生活事件构成的。

人民伦理的大叙事的教化是动员、是规范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教化是抱慰、是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的叙事伦理学不提供国家化的道德原则,只提供个体性的道德境况,让每个人从叙事中形成自己的道德自觉。伦理学都有教化的作用,自由的叙事伦理学仅让人们面对生存的疑难,搞清楚生存悖论的各种要素,展现生命中各种价值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让人自己从中摸索伦理选择的根据,通过叙事教人成为自己,而不是说教,发出应该怎样的道德指引。基斯洛夫斯基的《十诫》中讲过一位老太太的故事,她是伦理学教授,她教伦理学的方式就是通过讲故事举出人生中的道德困境,与学生一起分析这种困境的构成,由此形成道德自觉。自由的叙事伦理学不说教,只讲故事,它首先是陪伴的伦理:也许我不能释解你的苦楚,不能消除你的不安,无法抱慰你的心碎,但我愿陪伴你,给你讲述一个现代童话或者我自己的伤心事,你的心就会好受得多了。

自由的叙事伦理学激发个人的道德反省。弄清道德困境不等于道德问题解决了，每个人终究会面对“我该怎么办”？这只能由每个人依自己的道德意识作出选择。能够抉择的意识并不总是明朗。别人讲的故事，不仅有助于我明朗自己面临的道德困境，也有助于我搞清楚自己的生存信念。

自由的叙事伦理学更激发个人的伦理感觉，它讲的都是绝然个人的生命故事，深入独特个人的生命奇想和深度情感，以富于创意的、刻下了个体感觉的深刻痕印的语言描述这些经历，一个人经历过这种语言事件以后，伦理感觉就会完全不同了。

我初到香港时，住在一个曲径通幽的旧山村，村民爱养猫，满村是猫，人称隔猫村。邻里有个十五岁光景的女孩子，叫 Yukine。一天我用余食喂猫，有两只小猫来食。一只干瘦，长得不好看，一只长得圆润，特别好看。我驱赶长得不好看的小猫，想只让长得好看的小猫食，不料被 Yukine 看见了。Yukine 趴在围墙上对我说：

我刚学英文时，不懂 I am born 是什么意思。“我出生了”？中文的动词是主动态，英文是被动态，直译成中文应该是“我被出生了”。我觉得英文的意思对。我的生命起点不在我自己手里，不是由我决定的。我不能决定我的身体的美或丑、我的心性的明朗或忧暗、我的意志的坚韧或软弱，我自己的诞生完全是偶然的造化，不是我出生了自己，而是我被出生了。

我读的语文课本中有儒家的道德命令：“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这充满主动态的九个字令我好生恐惧,觉得像我这样生性弱小的人的生活希望被剥夺了。这样的道德命令没有给被出生就生性脆弱的人有自己的生活想像的余地,比如我天生就没有修身齐家的能力。在这九个字的道德命令面前,丑小猫没有能力去践行一种主动态的道德生活,只有自己倒霉,只有暗自哭泣。丑小猫倒霉全因为自己如此被出生了,它活该?谁会给丑小猫带来安慰?

马太、马可和路加还有约翰讲的故事中有好多麻风病人、妓女,他们都是一些没有能力去践行主动态的道德生活的人,他们只能甘于受歧视,还得怪自己的不是,为什么自己会被出生成这个样子……正当他们绝望时,耶稣突然闯进人间,给麻风病人、妓女和弱小的人带来上帝的国。这确实是不可思议的 event,就像 it is born 降临我。我的生命在主的怀抱里第二次被出生,这种重生对像我这样弱小的人来说非常重要。第一次出生受伤的可能性太大,被出生的我很可能没有能力选择我觉得的美好幸福。在主的怀抱里重新被出生,我没有力气的生命就可能完全不同了。被主出生的生命,不带有要我成为某种理想的道德规定的人的命令,主只是抱着我。

可是,不仅当时的犹太人,就是后来的许多基督徒,都有一种道德主义的圣人追求,要求每个人必须追求道德化的人格,据说道德化人格的实现,就是理想社会的实现,还说这就是上帝的国。我不觉得理想社会的实现就是上帝的国。耶稣说:“日子满了,上帝的国近了。”(《马